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下

撒拉族 百年实录



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

中国文史出版社



◆ 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 ◆

撒拉族百年实录

下 册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拉族百年实录:全2册 /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6

(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

ISBN 978-7-5034-6461-4

I . ①撒… II . ①全… ②青… ③青… III . ①撒拉族—民族历史—史料—中国

IV . ① K2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543 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4.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6.00 元 (全 2 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撒拉族百年实录》征编委员会

主 任：韩玉贵 李选生
副 主 任：惠爱宁 韩新华 马成俊 陈明范
委 员：马维胜 李发荣 韩永东 韩兴斌 马启信
马 伟 高设章 南果才让

主 编：惠爱宁
执行副主编：韩新华 马成俊 陈明范
特邀编审：马成俊

策 划：韩新华
责任编辑：南果才让 马 伟
特邀编辑：马文才 马海福
编 辑：高设章 马玉珊 南果才让 包广林
祁 婧 马海龙 韩德彦

目 录

(下册)

政界精英

- | | |
|--------------------|-------------|
| 3 我的革命生涯 | 韩应选(撒拉族) 遗稿 |
| 14 怀念父亲 | 韩德荣(撒拉族) |
| 19 在阳光下生活 | 韩有文(撒拉族) 遗稿 |
| 26 做一个大写的人 | 马有功(撒拉族) |
| 41 平凡往事成追忆,无怨无悔慰平生 | 韩玉贵(撒拉族) |
| 52 真理的追求 | 马兴旺(撒拉族) |

学海泛舟

- | | |
|-----------------------------------|-------------|
| 63 20世纪50年代撒拉语调研情况之回顾 | 韩建业(撒拉族) 遗稿 |
| 69 铮铮风骨写春秋
——记撒拉族语言学家克力木·韩建业教授 | 马 伟(撒拉族) |
| 79 我的传奇人生 | 韩永寿(撒拉族) 遗稿 |
| 86 撒拉族翻译家马耐斯 | 马成俊(撒拉族) |
| 91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 马维胜(撒拉族) |
| 104 撒拉族人文学者马明良 | 马少卿 |
| 115 跬步千里
——我的学术生活琐记 | 韩中义(撒拉族) |
| 128 半生驿路甘与苦 | 马成俊(撒拉族) |
| 140 我的人生三部曲 | 马文才(撒拉族) |

152 记忆中的田野工作

马 伟(撒拉族)

162 我的文史情结

韩新华(撒拉族)

文艺星空

183 文苑草创第一笔

秋 夫(撒拉族)

189 走出孟达峡

马 丁(撒拉族)

198 阿勒泰的撒拉人

阿 里(撒拉族)

204 书写民族和信仰的歌者

韩文德(撒拉族)

212 阿丽玛树下舞蹈梦

董淑琴(撒拉族)

223 我的水墨岁月

陈 珊(撒拉族)

创业之路

229 兴旺之路

韩兴旺(撒拉族)

254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记撒拉族企业家韩有发

赵顺禄

261 诚信是雪舟集团的灵魂

马有福(撒拉族)

271 成长中的绒业集团

韩志明(撒拉族)

291 天高任鸟飞

马五四么力(撒拉族)

经学人生

307 信仰与精神苦旅

——我的宗教世家

韩文德(撒拉族)

314 马米日阿訇事略

马全福(撒拉族)

316 我的宗教生涯

韩扫麦日(撒拉族) 遗稿

守望家园

323 守望母语

阿布都·卡得尔(撒拉族)

336 花儿唱到北京城

韩占祥(撒拉族)

341 走不尽的奋斗之路

——记农民的儿子马光辉

刘子平

346 我与撒拉语

张进锋(撒拉族)

劳模风采

353 缅怀韩哈三

马全德 潘民善

357 乐园要用汗水浇灌

——记“粮食状元”韩进孝

祁生虎 韩文良(撒拉族)

362 为家乡的腾飞加油

于晓陆

365 教育战线一园丁

赵琳

367 巾帼劳模魏如古牙

于晓陆

372 走访马晓兰

于晓陆

375 抗震救灾见丹心

赵琳

378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于晓陆

382 父老乡亲的贴心人

韩得福(撒拉族)

385 供销系统的实干家

赵琳

388 韩学良二三事

韩得福(撒拉族)

391 笑迎八方客的撒拉人

于晓陆

394 编者絮语

政界精英



我的革命生涯

韩应选(撒拉族) 遗稿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新旧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回顾我的革命生涯和成长历程，可以说，我的命运是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我一步步成长的过程，都是党培养的结果。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撒拉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撒拉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没有我从一个贫苦子弟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可能。

童年的一点记忆

1931年，我出生在循化县清水河东大庄村。这是个美丽的村庄，山水相依，景色秀丽。南有峻峭的大力架山和马儿坡山相连，北面隔河耸立着挺拔的小积石山，四周赤山红岭，形成了一片平原谷地，黄河银链似的从谷地一侧弯过，尽显出她的温柔和宽容，好似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饶，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

在家乡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昆仑中学。昆仑中学，既有普通班，更有少爷班，在不同身份的学



思考

生之间，各方面的差距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条件很差，家中又没有支援，大多数贫苦子弟也算闯过来了。1949年初中毕业后，我刚进高中不到两三个月，西宁就解放了。有一天，我们被拉到乐家湾机场抢修飞机跑道，干到夜里，见空中有架飞机掠过。有人说，那是马步芳的飞机，是马步芳逃走了。解放军兰州战役告捷，马步芳残部狼狽溃逃，西宁市顿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昆仑中学无形中宣告解体。于是，同学们在一两天之内悄然解散。

走上革命道路

离开昆仑中学，我和几位循化籍的同学背着行李，徒步走在数百里的回家山路上。一路上听不到谁说话，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茫然无措，不知道等待着各自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只感到往常多次行走过的路变得格外遥远。走到化隆，遇到了西进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到了黄河边，都是忙着过河的解放军。听说我们是从西宁来的学生，就优先让我们乘船过河。赶到家里时，一个乡亲都没见着，满院子都是解放军，家里的箱箱柜柜和不住人的房间都被部队贴上了封条。他们说，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是借用锅灶做饭吃。他们是穷苦人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乡亲们不了解他们，怕他们，就都跑到山上去了。末了，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帮我们动员乡亲们回来？”我感到这些兵确实和原先马步芳的兵不一样，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便答应帮他们把乡亲们叫回来。我刚跑到门外，却见乡亲们已经从山上回来了。原来，乡亲们也已经搞清楚了，这回来的部队都是些好人。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兰州解放以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亲率部队由临夏入青海，于1949年8月27日解放了循化县，随后北渡黄河，解放化隆，向西宁挺进。

回来后不久，一支解放军的武装工作队进驻村庄，又住在我家，可能是考虑到一方面是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另一方面是家里有我这么个中学生，便于开展工作。武工队里有一位姓冯的年轻军官，特别关心我，一有空就和我聊这聊那，很合得来。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该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并送我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革命书籍。从那以后，我便天天和武工队员搅在一起，帮他们写布告，帮他们召集群众开会，帮他们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帮他们征粮……就像清水河必然要流到黄河里一样，我也不知不觉地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不久，还是那位姓冯的年轻军官介绍我到县上的干部训练班学习，那是第一批地方干部训练班，也是我正式投身革命工作所迈出的第一步。训练班结束，我被分配到县公安局，当检察署书记员。那是1950年的下半年。

1950年11月，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兼第一任收音员。当时，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处于医治战争创伤、清除匪特残余、巩固人民政权、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的重要历史时期。那时在循化县与省城西宁间，只有崎岖的简易通道，靠骑马传递书信和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省上配备了一台超外差式直流收音机，用以直接地、快速地收听中央和省台的广播新闻和上级重要指示。我深感重任在肩，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身背这台全县唯一的收音机，步行5天到西宁，在省广播电台学习1个月的收音业务，随即返县开展工作。我的任务不仅要随时收听中央和省台的广播，更主要的是在晚上12点左右收记中央和省台的“记录新闻”，编印一份名为《广播》的油印小报，分送县领导、县级各机关单位及区、乡，直至村读报组。这份油印小报可称得上是循化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了，从记录、刻板，到印刷、发行，都是我一人干。通过它及时传递中央和省委的声音，同时也采访编写本县开展的减租减息、查租反霸、镇反、土改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情况和工作动态，成为县委用以指导工作的一条渠道。我为自己能在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事业中贡献一份力量而骄傲。

从区委书记到县委书记

1953年4月至1954年8月，我先后任二区副区长和区委书记。在这一年多时间，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始组建农村互助组、合作社这个中心工作外，由于1953年较严重的旱灾和虫灾，还需要组织群众进行抗旱、灭虫工作，同时还有剿匪任务。尽管难题多，任务重，工作起来很艰辛，但凭着对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腔热忱，我深入到各村各户去做工作，动员群众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组织群众与旱灾、虫灾做斗争。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干部群众的努力，我们二区在下白庄试办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这在全县都是领先的。由于收音员时期的理论学习和在区里的工作实践，我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1954年8月，我被提升为循化县委副书记，协助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新鼎同志开展工作。那年我23岁，刚刚有了第一个孩子。

我所以在政治上迅速成长，走向领导岗位，从主观上讲，自己是贫苦子弟，在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十分迷茫的新旧社会制度交替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把我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指导我走上崭新的人生道路的。只有加强学习，拼命工作，才能不辜负党的恩泽与期望。从客观上说，自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组织一直就把我作为民族干部重点培养，是由郭若珍、李恩普、李新鼎、刘永民等一批资深的老干部手把手带出来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只求工作与奉献而从不讲享受的精神品质与雷厉风行、果

断、严谨的工作作风。现在想起来，那时期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拓阶段，压力大、任务重，生活艰苦就更不用说。

1951年以前实行供给制，除了吃穿公家管外，只发二元薪金，那些老同志和我们一样，脚上只穿黄球鞋，买不起袜子。想抽烟了，又买不起香烟，就搞来廉价的新疆莫合烟丝卷着抽。下乡时每人还要身背一杆长枪，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8年，根据工作需要，我被选为政府副县长。这是我个人集党、政工作于一身的一年，也是全县各族人民深受灾难而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惊省内外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青海的叛乱从循化开始，循化的叛乱从岗察乡发起。这次由境内外反革命分子、地方敌伪残余势力互相勾结发起的武装叛乱，使我县城西地区几乎遭殃：叛乱分子打着“保护宗教，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旗号，妄图颠覆刚建立不久的我人民政权，围攻我县城达两天三夜，抢劫城西地区国有财产。县城内的全体干部和民兵利用城墙，予以坚决反击，直到解放军大部队渡过黄河，歼敌于循化城外。因为我是平息这场叛乱时的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之一，那年平叛中的部分漏网分子和劳改释放分子便怀恨在心，成为我在“文革”期间挨斗时差点丧命于歹徒匕首下的祸根。

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3年，我32岁，任循化县委副书记兼政府县长，正是干一番事业的黄金年华，却被从那以后不断发起的政治运动剥夺了干工作的权利。如果说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还算属于第一批解放者被解脱到化隆县搞社教运动，那么，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没能摆脱有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而又最艰难的一场噩梦。说它是噩梦，一是说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说来就来了，说批谁就拉出来批斗，自始至终都搞不清这场运动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二是指我本人是这场运动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从“文革”初期写给我的大字报中定为走资派，并提出“打倒韩应选”的口号起，我头上先后有“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班禅、喜饶嘉措集团分子”等。《韩应选三反言论集》就印了三大本，共300例，都是从参加工作以来的笔记本，包括会议讲话中一页页翻查，只要觉得对当时的“造反派”有用的都被断章取义地摘抄出来，成为天大的罪名。你不理解，没人能为你说清楚，你感到委屈，又找不到人诉说，于是，只好接受没完没了的交代、批斗、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

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拉得更远，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的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灭。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被1966年揪出来接受狂轰滥炸式的批斗，七斗八斗也没斗出什么结果，于是就让我靠边站，直到1973年恢复工作，整整7个年头。经过这7年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就我个人最深刻的体会有两条：

第一条体会是，这7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时期，自己的意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意志首先来自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坚定信念。那时我常在想：不至于将我一个从小参加革命工作，紧跟共产党的干部无故置于死地吧！这意志还来自一个敢于面对现实，无所畏惧者的骨气，专案组前后11次上报了对我的单行材料，要打倒我的调子一次比一次升级。那时候整完你的材料还兴本人签名，我就将材料中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条一条地删去。专案组的人气得没办法，只有骂“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一天，刚结束批斗会后，把我拉到一所清真寺前，要我和一些“四类分子”一起参加劳动，拆除清真寺的宣礼塔。我就挺着腰严正声明：这活我不能干！第一，我不是“四类分子”，不能和他们一起干活；第二，想怎么整我，随你们的便！拆清真寺不符合党的政策。

第二条体会是，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善良、正直的，并且是充满了智慧的。正因为有许多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的挺身而出，才制止了一次又一次的武斗。参加批斗会是从上面安排下来的政治任务，非完成不可。可批斗会后，却总有群众悄悄把我请到家里，拿出好吃的，盛情款待。有一次把我拉到偏僻的孟达村批斗，批斗会后安排在一位老人家里吃饭，老人端来了连他们自己都很少吃到的好菜好饭。为瞒过跟着我的两个人，他站在窗外，用撒拉语鼓励我说：“古人有话哩，没事了甬胆大，遇事了甬胆小。站在河水中就不要怕雨淋，事情总会有个结果的。早就听说你是条汉子，你会闯过难关的。”其实，老百姓朴素的心里头不仅亮堂的很，而且还在清醒地思考着一些复杂的问题。在我“靠边站”，停止工作，住在老家上屋院内时，就有乡亲问我：“《六十条》到底是谁制定的？”我回答说：“起初肯定是毛主席参与制定的，可现在又说全是刘少奇干的，谁能说得清楚呢！”“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搞清楚一些事情了。”那乡亲说完就走出了院子，却让我想得很多，想得很沉重：群众是肯动脑筋的，是有觉悟的。

噩梦醒来是春天

历史沉重的脚步终于走到了1973年。尽管“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中共十大的召开，在周恩来等同志努力下，一些被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众望所归的老干部得以重新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这毕竟反映了另一个重要趋势。大地感受到了一丝春风的气息。这一年我被重新起用，官复原职。省上同意我调换另县工作的要求，调到同仁县任县委书记。我没有发布什么“施政纲领”，也没待在办公室，到任后就开始下村庄、上草原，转过了一座又一座帐房，看过了一家又一家面柜，而后一系列的工作都围绕着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上做文章。由于工作踏实，且有政绩，1978年被提为黄南州常委、州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接到省上调令，调我去任海东地区副专员兼循化县委书记，这下难住了我，我怎么也没想到重返循化任职。当时的州委书记李新鼎同志也不让我离开黄南，并拉着我专程到西宁，找省委说情。可是省委书记梁步庭却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这样安排，是考虑了循化县干部群众的意见的。现在不是去与不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早点去开展工作的问題。你去后，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按政策办事。”

到了循化后，一些人十分担心我会向他们算“文革”中的“旧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说法，有的人还提出调动。也有“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找我谈应如何整治那些“文革”中整人的人。但我考虑党组织信任我，才派我来工作的，面对复杂的局面，我不能计较个人的恩怨，“文革”的事情还是让它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党员应该



做报告

有的胸怀。在两年多时间里，我坚决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大局出发，保持稳定，拨乱反正，团结县委一班人，快刀斩乱麻，主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是落实干部政策，并结合落实政策调整干部队伍；二是落实农村政策；三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农村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能退赔的退赔，不能退赔的则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助；逼迁到山区的，让人家回到本村；没有住房的解决住房，仅在街子河滩两岸一次性规划解决了180多户庄廓地。加上各个宗教寺院的陆续重新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那两年的粮食大丰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整个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省委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1年9月，我进入省委常委班子，并由省委派往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部学习。这一年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改革开放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在党内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次学习是对自己从思想上、理论上的一次全新的武装，加深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理解，尤其是解放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第二年学习结束回来，任海东地委书记。1983年调到省上，任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

省委那边，我分管统战和农牧口，任玉树、果洛工作指导小组组长，挑的是省委工作大头。而统战部这边的工作更加千头万绪，首先仍然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方面政策，比如解决平叛扩大化遗留问题，起义投诚人员问题，原工商业者问题，台胞台属人员问题，错划右派的平反安置问题，还有被查抄的全省大小100多家寺院的财产退还问题，等等。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政策性、原则性又很强，而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又不好按某些条条框框一概而论之。加上落实政策不只是政治上的落实，需要从经济上得到完全的落实，工作量很大。

其次，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合作，开始组建各民主党派的青海省委或支部。当时，除了民盟在我省有个基层支部，其他民主党派没有青海的组织，只有个别成员，与各自党派的中央直接联系。现在的各民主党派的青海省委，均从那时起才陆续组建起来的，其中的不少骨干如民盟青海省委的王丰才先生、民建青海省委的陆厚余先生、农工民主党青海省委的张祖荣先生等，都是那时候引进的新人。实践证明，青海的各民主党派都能认真履行职能，积极献计献策，为青海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恢复青海各州、县的政协组织机构，从而健全和完善了政协在青海的各级组织。记得是在1987年初的一天，省委主管组织的书记和组织部的几名同志找我谈话，大意是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省委对全省厅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民主测评，现在对本人反馈一下测评结果，考评意见认为我的工作很忙，有成效，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有决策能力，能把握大局，总体评价为优。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到对我个人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只感到工作起来头绪很多，忙忙碌碌的，总有些着急，许多该办的事没办好，其他的还好说，最主要的困难是青海财政拮据，缺钱，而对落实政策人员的经济补偿、考察培养党外干部、组建民主党派、恢复全省各级政协组织等工作，又都是需要经费来保证的，只得一次一次跑中央要钱，确实难度很大，但工作上是不敢有松懈的。

1985年10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突降在青南牧区，顷刻之间脆弱的牧区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自己作为分管农牧工作的领导，带领工作组奔赴到灾情最严重地区之一的玉树州曲麻莱县指挥抗雪救灾工作。到那一看，茫茫草原积雪厚度均在一米以上，气温降至 -40°C ，交通阻隔，乡、社通信中断，群众被困，断水断粮。听了县领导的汇报后，我感到情况十分危急，立刻与县领导研究安排救灾事宜，一方面组织人力去抢救被困群众，调查统计受灾情况；另一方面立即向省委汇报严重的灾情，提出救援方案。有的同志向我汇报曲麻莱秋智乡的一个牧业点，安顿了一些受灾群众，现在严重缺乏口粮和燃料，准备安排送救灾物资，但干部人手不够。我决定带工作组的干部去送粮，同时还可以到救灾第一线实地查看一下。县上的干部竭力劝阻说去那里的路不好走，有许多被雪掩盖的大坑，不小心会掉下去或滑下山坡，很危险，我想顾不上那么多了，救人要紧，坚持上了路。链轨式推土机在前面艰难地推雪开路，雪原上到处是成群成片因冻饿而死的牛羊，令人十分心疼。那一次我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七八公里的路走了整天，总算把物资送到牧民手中。半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在忙碌中度过，当救灾救急工作大致安排就绪后，我回到西宁，但心头却一直十分沉重，这次雪灾给青南牧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使大量刚刚过上富裕生活的牧民又陷入赤贫。

牧区经济脆弱，防灾抗灾能力太差，这样的灾害已多次重演。我想，像秋智乡那种救了不少人性命的牧业点，能否多修建一些，条件搞好一点，不但能救人还能救很多牲畜。我把这个想法给州、县的领导谈过多次，又找省上有关部门的同志谈。但客观地讲，当时只是一种初步的想法，况且那时牧区也刚开始实行承包制，牲畜作价归户，没有集体的力量和国家的支持，牧业点建设是不可能进行的。看到今天的牧区普遍搞防灾基地建设，“四配套”、“五配套”成效显著，成绩喜人，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高兴。

在政协领导岗位上

1984年第五届青海省政协全委会上，我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继续兼秘书长。